

防范国际金融风险的财税对策

□ 邓力平 郑 榕

近年爆发的多起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和冲击,在国际经济全球化尤其是国际金融自由化的背景下,探讨发展中国家经济稳定发展和对外开放之间的关系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本文结合我国当前面临的内外部经济环境,从财税政策方面对如何防范国际金融风险进行探讨和研究。

一、经济现象和政策内涵

首先对几对概念及其相互间的关系略加探讨: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经济泡沫和泡沫经济,国际金融风险和国际金融危机。

虚拟经济指的是金融性部门及这些部门中运行的金融性资产;实体经济指的是物质和劳务生产部门及其创造的价值。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构成一国现实经济的总体,发达的虚拟经济能够为实体经济的运行起到润滑作用,并且促进一国现实经济总体的繁荣,而实体经济则从根本上决定虚拟经济的发达程度和一国现实经济的实力和繁荣稳定。

经济泡沫指的是经济发展中金融性资产与实体经济部门资产之间的某种偏离状态。当货币特别是信用货币凭借其自身的符号特征,脱离物质经济实体开始自行运转的时候,就会不可避免地在现实经济中产生经济泡沫。信用制度、股份制度、交易所制度以及金融自由化制度的发展,为经济泡沫的滋长提供了制度条件;而金融衍生商品市场、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国际资本市场的发展则为经济泡沫的迅速膨胀提供了市场条件。因此,对一个开放型的市场经济来说,存在一定程度的经济泡沫一般是难以避免的。但是,当经济泡沫膨胀到相当程度,使得虚拟经济部门资产的运行完全独立于实体经济部门,并且在量上使得虚拟经济资产价值与实体经济价值的比率超过一定限度时,就会形成泡沫经济。泡沫经济的形成主要取决于虚拟经济的发达程度以及一国对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和控制力度。

国际金融风险,是指在一定的国际金融制度及国际货币体系下,主要通过各国货币汇率变动而表现出来的作用于一国经济所产生的各种结果的可能性大小,它与国内金融风险一起构成一国所面临的金融风险总体。国际金融风险是国际金融自由化、国际化的必然产物。在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下,国际金融风险实际指的是在完全信用货币制度及汇率主要由市场调节的

条件下,伴随着国际金融不断创新,以国际游资为主体的投机性行为对一国货币、财政、外贸等经济战略可能造成的冲击,一旦这种可能性的冲击变为现实性的冲击,国际金融风险实质上就转化为国际金融危机。因此,国际金融危机是国际金融风险在量上积累到一定程度所发生质变而表现出来的一种形式。

对开放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国内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开放会刺激虚拟经济的成长,在宽松的国内货币政策条件下,虚拟经济资产的价值将以乘数方式扩张,并伴之以经济泡沫的急剧膨胀,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泡沫经济。泡沫经济为国际金融风险向国际金融危机转化提供了国内经济环境。从近年来一些国家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国内经济环境看,都普遍具有以下几方面特征:一是国内实体经济基础脆弱,包括结构上的不均衡和总量上的虚弱;二是国内虚拟经济非健康运行,包括制度失控和投机盛行;三是泡沫经济已经形成,表现为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比率严重失衡。国内经济基础薄弱削弱了政府对国际金融风险冲击的承受能力,而国际金融风险一旦转化为国际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冲击也不仅仅局限于金融体系,而是涉及到国家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说,国际金融风险已经不单纯是金融体系内部风险,对国际金融风险的防范,也不单纯是金融体系面临的课题,它实际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如何在以增长为目的的开放政策和以稳定为目的的调控政策之间的协调。在这一问题上,国内外经济界人士都把注意力放在金融、外汇和对外开放政策方面,这些方面的政策措施固然重要,但财税政策在这一协调中的作用也不容忽视。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麦金农(Mckinnon, Ronald I.)将健全的财政制度做为金融自由化的首要条件,他的理论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得到一定程度的证明:凡是受危机严重冲击的国家大都财政制度不健全,包括支出膨胀、债台高筑、赤字严重,以至于危机降临时政府毫无抵御能力。因此,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为它们开“药方”时,其中必不可少的一条就是削减政府开支、压缩赤字。就我国财政状况而言,在某些方面存在的问题与已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有相似之处。随着我国经济全面开放程度的逐步提高,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形势对我国的影响将逐渐加大,为抵御国际金融风险,必须加强国内经济机体的免疫能力。为此,财税体制改革应当进一步完善,使财税政策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二、防范国际金融风险的财税对策

运用财税政策加强我国国内经济实力,增强防范国际金融风险的能力,至少应从内部宏观经济形势、外部经济环境和财税管理体制三个方面入手。

首先,就我国当前的内部宏观经济形势而言,在连续若干年采取适度从紧的宏观调控政策下,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目标,宏观经济总量基本达到平衡,国民经济成功实现了“软着陆”,摆脱了困扰多年的商品短缺局面。1998年我国将在继续坚持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保证通货膨胀率低于3%的同时,增加投资规模刺激国内有效需求,以拉动经济发展,确保国民经济8%的增长速度。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认为财税部门应采取以下政策措施:(1)扩大政府支出刺激国内有效需求;(2)适当降低关税增加进口以刺激国内外的投资需求;(3)通过财税政策导向,加强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企业技术进步;(4)加强税收征管,提高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为其它政策措施的实施提供财力上的保证。以上措施的实施在当前形势下对于防范国际金融风险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积极意义:(1)有利于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为虚

拟经济的正常运行提供稳定的环境；(2)通过财税政策扩大有效需求，缓解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有利于保持社会的稳定；(3)通过加强税收征管来增加税收收入，一方面可以避免因税负增加对经济的抑制作用，另一方面又有利于治理当前严重的税收流失现象；(4)有利于缓解金融压制，增强在缓解金融压制过程中对国际金融风险的承受和化解能力。

其次，就我国当前的外部经济环境而言，此次亚洲金融危机虽然没有对我国国内金融市场造成直接的正面冲击，但是对我国转轨时期的开放型经济造成压力及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其中最突出的压力是由于东南亚国家货币的贬值使我国的外贸出口形势严峻。面对这一问题，我们认为可以通过提高出口退税率来促进出口。一般来说，一国可以通过对汇率政策和出口退税政策的运用达到鼓励本国商品出口的目的，但这两项政策在具体运用中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却是有区别的，表现为：出口退税是一种单向的政策工具，它一般只能影响出口贸易，而对进口贸易的影响却较小，因此，出口退税的经济效应较单一，可供政府灵活运用；而汇率政策却是一种双向调节的政策工具，它在调节出口的同时也会对进口起反向调节作用，汇率政策的经济效应较为广泛复杂，操作运用难度较大。为维持国内乃至世界经济的稳定，我国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不准备采用货币贬值的办法来促进出口，在这种情况下，就必然要通过提高出口退税率来促进出口。从我国现实经济条件看，目前提高出口退税率既有条件，也是时机，因为：(1)随着我国对有进出口经营权的生产企业实行“免、抵、退”措施的执行，1997年我国出口退税工作基本到位，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2)近年来制约我国出口退税的国家财力约束有所缓解；(3)一段时期以来随着税收征管改革的深化，税收征收环节的减免有所控制，偷、逃、骗税现象有所改善。因此，在当前经济形势下，提高出口退税率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最后，借鉴亚洲部分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教训，我国应加强财税体制的管理，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具体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加强对外债的管理。此次亚洲金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债务危机，虽然没有墨西哥及拉美国家那么严重，但也严重削弱了政府在风险降临时对局势的控制能力。这些国家债务危机的根源在于财政管理不善，例如泰国在实行金融市场全面开放的同时，对外债规模控制不力，1997年外债规模达900亿美元以上，商业银行的外债余额超过了银行自有资本的两倍。我国政府一直重视外债管理，外债大多为中长期的国际组织和政府贷款，风险较小，但我国外债管理中也长期存在外债规模上升过快、使用效率不高、币种单一从而使汇率风险较大等问题，这些问题若不及早加以重视和解决，势必会对经济和金融的稳定产生不利影响。二是应加强对企业(尤其是大中型企业)财务状况的监督。韩国前30家大企业负债率高达449%，是导致金融危机的一个最主要的微观经济根源。我国企业也同样存在财务结构不健全，负债率过高的问题，因此，当前应特别着重加强对大企业的财务监督，健全财务制度，塑造防范国际金融风险的微观经济基础。

参考文献：

1. “1997年经济形势分析和1998年展望”，《管理世界》1998年第1期。
2. 维托·坦齐编《开放发展中经济的财政政策》，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年版。
3. 尹音 著《涉外税收论纲》，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4. 张建伟“泡沫经济的实证分析与制度分析”，《经济动态》，1997年第3期。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财政科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陈黛斐)